

目录

[一、科研成果......................................4](#_Toc19371)

1.吴向东,刘爽,王鑫.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J].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21，6(05):33-42...................4

2.代海强.情境认知对梦境怀疑论问题的解决——认知神经科学与哲学交叉视域下的反梦境怀疑论研究[J].哲学研究，2021，(10):118-127+129...............................4

3.代海强.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进路下的高阶意识理论研究——从梦境的意识经验谈起[J].社会科学战线，2021，(11):33-42+281..........................................5

4.郑伟,赵航.“总体性辩证法”的关键问题及其解答策略[J].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21，6(06):76-84...............5

5.李祥俊.儒家礼学核心精神的演进历程与现代转化[J].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21，6(06):54-66.................6

6.张永芝.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J].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21，6(06):14-29.....6

[二、学术讲座与活动 7](#_Toc9558)

1.罗素的悖论、康托的定理、弗雷格的“出路”............7

2.Vagueness as Ignorance via Vagrancy..............8

3.“京师价值与文化”系列讲座（五）：右翼民粹主义、西方政治极化及其潜在的政治哲学逻辑.......................9

4.从语用入侵看Grice循环............................9

5.“精神世界”的空间图景.............................10

6.“中华文化国际青年研习项目2021”开幕式隆重举行.....11

三、学术交流与会议...............................13

1.“价值与文明：中国共产党100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举行....................................13

2.《思想政治课教学》创刊40周年暨“学党史讲思政”一体化教学研讨会在京举行................................16

四、媒体报道与宣传...............................21

1.沈湘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21

2.韩震：伟大建党精神奠基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基因结构，光明日报，2021年11月08日06版.............40

3.吴向东：价值与文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光明日报，2021年11月15日15版.............................45

一、科研成果

**1.吴向东,刘爽,王鑫.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J].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21，6(05):33-42.**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全人类命运与共的重大现实和当今世界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展现“世界之中国”的大国智慧和担当，原创性地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并阐述了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六个方面层层递进、相互关联，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基础，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价值引领，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价值核心。

**2.代海强.情境认知对梦境怀疑论问题的解决——认知神经科学与哲学交叉视域下的反梦境怀疑论研究[J].哲学研究，2021，(10):118-127+129.**

摘要:目前学界对梦境怀疑论的传统处理面临着诸多困境，本文试图结合概念分析和梦境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为解决梦境怀疑论提供帮助。梦境怀疑论的前提"梦境与清醒不可区分"和表达形式"我怀疑我在做梦"都存在问题:梦境与清醒在情境认知层面有着本质区别，说明怀疑论语境中二者不可区分的基础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据此抵御怀疑论;梦境怀疑论的表达形式源于反思认知，但是情境认知不能产生怀疑，这表明梦境怀疑论的表达形式有特殊限定，我们可以据此终止怀疑论。非清醒的梦、假清醒的梦、清醒的梦等产生的梦境难题，以及来自极端怀疑论的梦境挑战，都能在上述框架下得到解决。认知神经科学与哲学交叉视域下的反梦境怀疑论研究是回答传统哲学问题的一个新的解决路径，同时也能为其他相关领域的交叉研究提供借鉴。

**3.代海强.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进路下的高阶意识理论研究——从梦境的意识经验谈起[J].社会科学战线，2021，(11):33-42+281.**

摘要:梦境是否是有意识的经验，是梦境研究的核心问题。怀疑论哲学家从概念思辨出发，否认梦境的意识经验特性;认知科学家从经验发现出发，承认梦境的意识经验特性。文章在融合概念思辨的启发与经验研究的成果基础上，尝试提出一种新的高阶意识理论，解决梦境的意识难题，以此调和经验路径与概念路径的分歧。文章认为，完整的意识活动包含高阶意识和原初心理活动，一般的梦境是一类独特的"准意识经验"，它是特殊的原初心理活动，缺乏高阶意识活动。文章的观点将对梦境研究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为认知科学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和可能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为心灵哲学贡献新的解决方案。本文对一般的科学与哲学交叉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

**4.郑伟,赵航.“总体性辩证法”的关键问题及其解答策略[J].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21，6(06):76-84.**

摘要: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的构思，既包含着对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呼应，又体现了对“经济决定论”“修正主义”思潮进行批判的现实需求。“总体性辩证法”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20世纪初的欧洲环境中论证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有效性。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性使用，“总体性辩证法”最终没有跳脱“逻辑统摄历史”的意识形态解读框架。这一框架在批判“经济决定论”的同时，没有注意到“经济决定论”本身所针对的时代问题，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意识形态决定论”的嫌疑，为后来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悬置”做了铺垫。

**5.李祥俊.儒家礼学核心精神的演进历程与现代转化[J].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21，6(06):54-66.**

摘要:儒家礼学渊源于上古三代尤其是西周的宗法制度、礼乐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了思想内涵丰富的义理系统，主要涉及礼的功能、本质、依据等各个层面。儒家礼学肯定礼对社会政治的稳定作用，认为礼的本质是亲亲、尊尊基础上的差异性，而关于礼的依据的内在性情、超越天道的论述则构成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儒家礼学在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遭遇困境，对其批判与维护的论争构成儒学现代转化的重要内容。考察儒家礼学思想内涵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探索儒学现代转化的现实路径。

**6.张永芝.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J].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21，6(06):14-29.**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深化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历史发展逻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与变化了的时代相契合，以反映人们的利益和需要的变化。第二，理论深化逻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等方面深化发展，包括构建基本理论体系，深刻阐释具体价值观的来龙去脉，深化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以及教育传播规律研究，核心价值观与制度、语言、行动的关系研究等。第三，实践推进逻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国家、社会和个体的实践活动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发挥实效性、促进生活化和提高话语权。第四，方法论创新逻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应改变轻理论重实践、各个学科独立进行的现状，有必要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有机互动、多学科交叉研究、注重借鉴自然科学逻辑和实证的研究方法上不断创新。

二、学术讲座与活动

**1.罗素的悖论、康托的定理、弗雷格的“出路”**

2021年10月15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主办、逻辑与认知科学研究所协办的“罗素的悖论、康托的定理、弗雷格的‘出路’”讲座在前主楼A803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特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郝兆宽主讲。郝兆宽老师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理逻辑、数学哲学和哥德尔思想。

在本次讲座中，主讲人重点探讨了弗雷格在《算术的基本定律》后记中提出的“弗雷格的出路”，即基本定律V’。主讲人指出，虽然这一方案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仓促之作，但也有论者认为它体现了深刻的哲学和数学洞察力。主讲人通过讨论弗雷格基本定律V及其哲学动机，进而探讨了新弗雷格主义的方案。主讲人认为，这些方案在数学和哲学上与弗雷格最初的逻辑主义构想存在较大差异。相反，哥德尔关于绝对可定义性概念的设想以及当代集合论中基于这一设想的实践可能才是弗雷格的真正出路，也是逻辑主义和逻辑本身的出路。

**2.Vagueness as Ignorance via Vagrancy**

2021年10月2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主办、逻辑与认知科学研究所协办的学术讲座在前主楼A809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特邀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陈龙博士主讲。陈龙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学哲学、逻辑哲学、早期分析哲学史。

主讲人围绕模糊性悖论（尤其是堆积悖论）展开了深入探讨。该类悖论自古希腊时期起便广为哲学界关注，源于涉及谓词（如“是堆积的”或“是高的”）的应用边界的不确定性。传统解决方案多通过修正经典逻辑原则（如采用模糊逻辑，放弃排中律）或修正标准语义学（如通过超估值理论放弃二值原则，接受真值空隙），甚至同时进行这两种修正。另一种途径则是将不确定性归因于我们自身由于知识的本质而产生的无知（由T. Williamson详细阐述）。主讲人通过引入“游移谓词”的概念（由N. Rescher提出，谓词F是游移的当且仅当存在x使Fx为真，而对于任何具体确定的c，Fc均为假），从不同于Williamson的角度，试图将模糊性解释为某种无知，并为堆积悖论提供更为满意的解决方案。

**3.“京师价值与文化”系列讲座（五）：右翼民粹主义、西方政治极化及其潜在的政治哲学逻辑**

2021年10月29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哲学学院研究生会主办的“京师价值与文化”系列讲座（五）在北京师范大学前主楼八层A803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周穗明研究员主讲，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周凡教授主持。周穗明研究员是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位哲学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研究员。1990年在中共中央编译局评为副研究员，1995年评为研究员，1998年起享受国务院专家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2005年担任两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正高职称评委会委员。曾为捷克科学院哲学所、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美国社会科学新学院大学（福特基金）访问学者；从2006～2018年先后受聘为中山大学等7所院校客座教授。专业领域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英美）。公开发表专著、译著23部、编著6部，论文译文270余篇，其中《报刊复印资料》转载70余篇，《新华文摘》载若干篇。主要代表作有：《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下册，学习出版社2004）；《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201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八届离退休人员科研成果一等奖）。近年来重点跟踪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的崛起与威胁，主要研究当下西方极化政治的政治哲学根源和社会背景。

**4.从语用入侵看Grice循环**

2022年11月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逻辑与认知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从语用入侵看Grice循环”讲座在前主楼A803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特邀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荣立武主讲。荣立武老师是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兴趣包括语言哲学与语用学、逻辑哲学以及分析哲学视域下的意义理论、实践推理和推理的元哲学研究。同时，他还担任山东省逻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在《哲学研究》、《逻辑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并有独立译著两部。

主讲人围绕Grice的会话蕴含理论展开论述。他指出Grice区分了言说意义的所言和所含，但语用入侵现象模糊了二者界限，导致所谓Grice循环。主讲人分析了Capone用会话蕴含理论解释语用入侵的策略，认为该策略在直接表达意图的言说情况下会失败，从而揭示了会话蕴含理论在分析言说意义时的局限性，为重新思考言说意义理论提供了新视角。

**5.“精神世界”的空间图景**

2021年11月26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辅仁国学研究所主办，哲学学院研究生会协办的“‘精神世界’的空间图景”讲座在前主楼A802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特邀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明主讲，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李祥俊教授主持。

主讲人围绕着“精神世界”的空间向度展开论述。他首先解析了“精神世界”一词的内涵，认为“精神”指人的意识活动，而“世界”意味着以人的尺度所打量的时空秩序。接着主讲人探讨了“精神是否占有空间”的问题，以风景画为例区分了“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三种空间概念。他指出，意识之所以能开辟精神空间，在于其具有记忆、想象和概念推理的能力，图像是意识的根基。文学、艺术等都能丰富和拓展人的精神空间。最后，主讲人用"看”“说”"思"三个动词总结了三重空间及其特征，其中"思"指的是与现实保持距离的精神空间中的事物。

**6.“中华文化国际青年研习项目2021”开幕式隆重举行**

2021年11月29日，“中华文化国际青年研习项目2021”活动开幕式在线上隆重举行。今年的研习主题是“中国哲学视域中的共同性理念”，帮助学生感悟东方哲学智慧，开拓学术视野，提升学术水平，促进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培养有志于从事汉学研究或中外交流的青年领袖。本次活动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承办。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存山，国际儒学联合会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肖铠，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院长吴向东等多位嘉宾出席了本次研习活动的开幕式。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罗松涛主持。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存山转达了刘延东会长对各国青年学者的问候，寄语各国青年，希望各位师生珍惜研习机会，把读书治学、切磋交流、考察体验紧密结合起来，深入了解历史的中国、当代的中国，做人类多样文明的维护者传承者。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各国和平与繁荣作出努力。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院长吴向东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各位青年学者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要与不同的文化相交流，相融合。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让我们一起携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最后，来自巴基斯坦的乌勇（Fawad Ullah）作为学员代表发言，他表示21世纪以来，中国语言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因为对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学习越来越成为世界学术潮流。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过程中，了解到汉语语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共同体”。通过哲学学院中哲研究所老师的指导，他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并非仅仅是一种通俗观念，而是有着深厚的内在哲理蕴含。他认为，当今世界面临如环境变暖等诸多挑战，而中国先哲的许多智慧是可以被当今世人所借鉴的。

本次研习活动的授课教师由来自全球6所高校的7位知名学者组成：北京大学安乐哲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笑敢教授、卢布尔雅那大学罗亚娜教授、中山大学梅谦立教授、山东大学贝淡宁教授、浙江大学彭国翔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大卫巴拓识博士。同时，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蒋丽梅副教授、崔晓姣博士和朱雷博士担任学业导师，组织学生线上讨论。近80名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学者通过线上的方式参加本次研习活动。

在研习活动中，7位学者将分别围绕“何谓‘共同体’”、“身心修养与自我认同”、“家庭和谐与社会交往”、“民族国家与天下大同”4个分主题进行授课，充分展示东方文明的哲学内核、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博大精神。授课结束后，学生将在学业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分组讨论，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并完成论文写作。研习活动希望能以此为契机，为开展契合新时代发展潮流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榜样。

在首日讲座中，安乐哲教授以“儒家角色伦理学：对个人主义观念的挑战”为题、贝淡宁教授以“西方社群主义者与东亚儒者：差异为何？”为题先后进行了精彩的学术讲座，并与学员在线上进行了热烈互动。

本届中华文化国际青年研习项目为期五天，将以专业讲座、小组讨论、学生辩论等多种形式的课程活动，展示中华文化的哲学内核及其博大精深的智慧结晶，通过文化体验、成果展示等丰富多样的课程活动共同开启一场文化学术之旅。

三、学术交流与会议

**1.“价值与文明：中国共产党100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举行**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总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价值意蕴，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新时代的发展，2021年10月16日，“价值与文明：中国共产党100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国际中心（珠海）承办。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安徽大学、内蒙古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哲学研究》杂志社、《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网等新闻媒体和出版界的编辑记者近百人与会。

开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党委书记韦蔚与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院长吴向东分别致辞。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罗松涛主持。

韦蔚书记代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致辞。她着重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和哲学国际中心（珠海）近年来的建设和发展情况，对来自全国各地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吴向东主任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哲学国际中心（珠海）致辞。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中，始终包含着价值文化的面相：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价值建构为核心，推动着文化的变革，文明形态的创新，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中国道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文化革命、文化建设到文化自信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价值与文明的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丰富的思想与实践成果。它们主要包括：（1）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构筑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与中国精神；（3）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4）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这个重要历史节点，总结中国共产党价值与文明百年探索的丰富历程，探究其价值建构与文明创新的内容、方法和路径，反思其探索创新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将会有力促进价值文明观基础理论研究，从哲学的层面展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与文明新境界，深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道路的自我理解，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开幕式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大椿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欧阳康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龙静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冯颜利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杨学功教授围绕“价值与文明：中国共产党100年”会议主题，分别就“智能时代人类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整体主义及其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贡献”“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了首场主题报告。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立新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杨生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立波教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进平教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白刚教授就“中国道路的前进定力”“文明的本质及其价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中国共产党人与正义诉求”“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了会议主题发言。

本次学术研讨会为期两天，期间包括“青年圆桌论坛”，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近30名博士后与研究生将围绕会议主题展开研讨。

**2.《思想政治课教学》创刊40周年暨“学党史讲思政”一体化教学研讨会在京举行**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研究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经验和规律，探讨党史教育如何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回顾总结40年办刊经验，2021年12月17日，庆祝《思想政治课教学》创刊40周年暨“学党史讲思政”一体化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材研究院承办。

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徐青森、教材局申继亮一级巡视员、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郭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韩震、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林崇德、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院长吴向东、《思想政治课教学》创刊社长贺允清、全国优秀教师湖北省武汉市解放中学思政教师吴又存、优秀教研员代表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张彩霞老师等出席座谈会并作交流发言。

教育部社科司教学与出版处处长陈睿、四级调研员潘红涛、人民教育出版社政治编辑室副主任任海宾、北京师范大学科研院副院长孙宇、北京师范大学教材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弛、哲学学院党政班子成员，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新老编辑，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代表、全国各省市教研员和优秀作者代表，以及来自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报》和教研网等媒体记者近一百人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与会。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思想政治课教学》副主编罗松涛主持。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为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教育战线久久为功，扎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一系列重要批示指示，推动思政课建设发生了格局性变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彰显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作用。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开展党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教育引导学生弄清楚当今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自己所应担负的历史责任，有效提升学生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讲好百年党史，讲好“大思政课”，凝聚培养时代新人的强大合力。

周作宇在欢迎辞中指出，本次研讨会以“学党史讲思政”一体化教学为主题，围绕党史教育如何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进行专题研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在这个重要历史时刻，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历史交汇点上，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研讨如何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如何发挥思政课在“四史”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重大使命和责任担当，更是办好《思想政治课教学》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40年来《思想政治课教学》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与时俱进，紧紧把握时代脉搏与课程改革方向，在促进思政学科研究成果传播、培养思政专业人才、推动学科发展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希望杂志以创刊40周年为契机，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期高品质学术期刊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系统总结40年办刊积累的宝贵经验，对标高品质的目标要求，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林崇德回顾了自己作为读者和作者与《思想政治课教学》结下的深厚情谊，充分肯定了杂志40年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在题为“从核心素养中认识‘学党史讲思政’一体化教学的意义”的主旨发言中，他指出要从核心素养的基本定位入手，明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要求，从文化传承、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三个维度，建构以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有机融合的核心素养总框架。由此，凝练出以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为内容的中学思政课核心素养。针对目前课程与教材面临着全球化、大众化、网络化的问题，思政课程与教材要体现国家意志，打好中国底色，注入红色基因。从学习党史中汲取智慧力量，提高学生思政素养。

郭戈在座谈发言中表示，北京师范大学拥有《思想政治课教学》和国家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教材研究基地，杂志和基地促进了思政教材事业的蓬勃发展。他建议今后加强双方合作，进一步加强思政课资源立体化建设，共同推动思想政治课的改革与发展。

吴向东主任在杂志创刊40年发展汇报中，回顾了杂志的发展历程，总结了40年办刊经验，明确了未来发展规划。他表示，40年来，《思想政治课教学》与时俱进、与时代同行，通过深度参与思想政治学科建设、课程标准修订和教材编写修订等工作，全方位推动素养导向的思政课程改革，推进思政课程创新性内涵式发展，以高水平的学术平台建设，引领思政教师专业成长。未来，《思想政治课教学》将充分吸收各位领导专家的指示建议，在三个方面继续努力：一是坚持正确办刊方向；二是突出问题导向，强化创新意识；三是传承优良办刊传统，加强编辑队伍自身能力建设，坚持有特色、高质量发展。

《思想政治课教学》40年的发展，得益于几代编辑的辛勤耕耘，得到全国各地老师和读者朋友的大力支持。在杂志创刊40周年之际，编辑部评选出为杂志建设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40位代表。座谈会现场，徐青森司长和周作宇副校长为获得卓越贡献奖的杂志社老前辈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

《思想政治课教学》创社社长贺允清回顾了40年前办刊的光荣历程。面对新时期党中央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要求，他对杂志发展寄予殷切希望。建议杂志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编委会和编辑部建设，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优秀作者代表，全国优秀教师湖北省武汉市解放中学思政教师吴又存，结合杂志发展与自身成才作了线上发言；优秀教研员代表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张彩霞老师作了题为“坚守初心，引领创新”的线上发言。

在“学党史讲思政”一体化教学主旨报告单元，韩震作了题为“教育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的报告。他指出，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只有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来抓好教育，才能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

“学党史讲思政”一体化教学课堂观摩研讨单元由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教研员杨灵主持。北京市西城区西师附小韩雪、北京市三帆中学罗霞、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韩月华三位老师分别进行了“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引路人”和“讲述党史故事 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党史中的法治力量”的课堂教学。来自福建省建瓯市实验小学的黄文英老师、江苏省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的周智宁老师、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陈明青老师、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的顾瑾玉老师、金利老师和刘媛老师，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钟晓琳老师和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晓东老师、石芳老师，先后对三位老师的课堂教学作出了精准专业的点评。

大会总结暨闭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学院教授、《思想政治课教学》主编王葎主持。她回顾了此次研讨会的主要活动安排，介绍了研讨会的前期筹备工作，总结了40年来杂志的办刊特色。她表示，40年前，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紧跟时代节拍应运而生，40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几代编辑同仁的不懈努力和广大读者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杂志坚守初心、志存高远，始终紧跟时代步伐，活跃在思政课改革的第一现场。新时代，杂志发展任重道远。未来，《思想政治课教学》将一如既往，立足对新时代思政课发展特点和思政课改革要求的全面深入把握，勇担使命、接续奋斗，再谱新时代发展新篇章。

四、媒体报道与宣传

**1.沈湘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在新的征程上，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历史上首次从党的指导思想高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新“相结合”）的命题，并将之放到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等高度。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创新，也是新征程中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要求和必须完成的伟大课题。

一、新“相结合”的基本意蕴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取得百年辉煌的最基本经验和核心密码所在。所谓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要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结合，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在此意义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说本就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题中之义。但是，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单列，并与“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列，有着特殊的针对性和深刻意蕴。

第一，更加突出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根基。当我们说到中国具体实际时，直接指称的是当代、当下的中国现实国情。然而，“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在这一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文化则是这个民族、国家的灵魂。事实上，一切当代、当下的实际都是以往历史文化的结果，历史文化是当代、当下实际成为可能的根基。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不同，其基本国情就必然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深刻认识到，“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归根到底，“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而且，“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因此，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更加突出和巩固我们的历史文化根基。

第二，更加彰显党性和民族性、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在中国人内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说是思想旗帜与文化基因的结合，思想灵魂与文化根脉的结合，指导思想与文化沃土的结合，是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与中华民族突出优势、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之间的结合，也是中国人的政治信仰与文化信仰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理服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如果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突出的是“中国”及其客观物质实际，那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突出的是“中华”及其精神实际、人文实际，更加突出民族性、人民性的方面。因此，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事实上更加彰显了党性和民族性、人民性的有机统一。

第三，鲜明标识“基本”与“优秀”的结合。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体系博大精深，内容极其宏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之相结合未必要也不可能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每个具体观点亦步亦趋地相结合，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毛泽东当年曾就文学艺术如何学习、贯彻马克思主义有过精彩的论述：“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同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绝不是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写马克思主义讲义，一切由马克思主义包办代替。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中具有普遍性、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同样，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传承的全部文化的总称，是一个中性的集合概念。毋庸讳言，这其中既有优秀、精华的部分，也有封建、落后、糟粕甚至腐朽的部分。后者当然没有资格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我们所说的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一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的精华。因此，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意味着要反对关于两者非此即彼、简单二元对立的教条主义态度，实现精髓与精华的强强结合。

第四，深刻蕴含“相结合”的多重含义。自从以马克思主义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人在精神上就从被动走向主动。在“相结合”的关系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处于主动的一方。然而，传统文化是先在的力量，植根于中国人内心，形成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不能站得住脚，能否生根发芽，能否与时俱进地发展，从深层来说要看其能否与中华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相“适应”，这应该是“相结合”的第一层含义。经由历史的千回百折，传统文化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和内在基因。这种心理和基因是如此强大，以致不是人们去选择它，而是它在筛选所有的思想主张、政治力量——谁能继承、发扬这种强大的基因并能实现其现代性的转换，谁就能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领导力量。“相结合”的第二层含义就在于“鉴别”，即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科学地、辩证地对待所有传统文化，区分优秀与落后、精华与糟粕，从而能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相结合”的第三层含义则在于“激活”，即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适应、鉴别、激活的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而是更为复杂、有机的关系。

第五，明确指示“相结合”的根本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九个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第三个“必须”——“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内容。百年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反过来，只有马克思主义行，才能保证共产党能，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不仅因为其基本原理是科学的，还因为其拥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品质——或者说与时俱进是其科学性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不断推进其实现民族化时代化，收获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征程上，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保证马克思主义永远行！如果说，以往我们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多是一个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那么新“相结合”就还有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也就成为了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二、新“相结合”的思想其来有自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虽然是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正式、自觉、科学地表达出来，但这一思想其来有自，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有一个孕育、发展、成熟的过程。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提供了理论的源头活水。

马克思恩格斯以最彻底的态度反对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始终强调在改变世界中认识世界，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即“革命的科学”和“历史科学”。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批评当时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指法国的社会主义著作——引者注），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在1872年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77年马克思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信说，一些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还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历史环境中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不进行具体的研究，而依靠“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找不到真正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的。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1885年恩格斯在给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曾说过：“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无论是强调历史运动、生活条件、历史条件、历史环境，还是更为具体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其实都隐含和折射着一个国家、民族独特而纵深的历史文化背景。甚至马克思在1872年还明确指出，国际工人运动“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

如果说上述还更多是突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话，那么恩格斯晚年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建议则更进了一步。1887年1月，面对当时兴起的美国工人运动，恩格斯在致美国社会主义者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写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 （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以自己内在的“亲身的经验”去验证而非外在的“理论硬灌输”，才能使理论深入“心坎”。这不只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教育的普遍方法，而且具有着眼于美国这个具体国家的特殊针对性。正如恩格斯所自述的，在1888年8、9月游历美国之前，“我们通常都以为”美国人“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事实上今天的美国依然如此。因此，恩格斯1887年的上述表述就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即针对美国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尽管那时美国还是一个新国家。这也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不仅需要外在的条件，而且需要切身的体验、内在的体悟，更需要与一个民族、国家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相适应。只有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产生共鸣共振，作为革命运动前提的主体内在条件才能真正成熟。

另一方面，百年党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史、结合史。

中国共产党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旗帜的同时，就将自己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就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光辉的探索。一部百年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这个历史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其转折点就是在反思革命失败原因中批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话中首次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的任务。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从大历史观、马克思主义态度和服务现实需要等角度强调了总结、学习、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极端重要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其中当然就包括了传统文化观。他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统一过程中民族特点、民族形式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只有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完全”“恰当”的。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本质上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居于首位。

为了从思想路线上彻底纠正教条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在1941年开展了整风运动。在作为整风运动开篇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话中，毛泽东批判许多同志“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们“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从文风和思想路线的高度强调了学习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极端重要性。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这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地思考、定位党和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关系，进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关系。5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而“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这一文献将毛泽东的相关思想系统化，实现了两个“首次”：首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首次明确提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文化结合起来。

建国以后，毛泽东也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神，并身体力行和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学习历史文化典籍。他曾以律诗和郭沫若曰：“劝君少骂秦始皇”，因为“百代犹行秦法政”；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说过：“西方思想……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实质上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种生动表达。后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不同角度强调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都蕴含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旨，并在不同层面作出重要贡献，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民族复兴的高度十分重视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重要论述既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也为我们进一步推进这一结合提供了思想前提和重要遵循。比如，科学定位，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激发自信，将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作为坚定文化自信的根基；正本清源，系统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激活传扬，着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铸魂育人，强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贯穿国民教育；面向世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提供精神指引，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直接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创新思想，则有三个重要的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2013年考察山东孔府、视察曲阜孔子研究院，并于2014年以国家主席身份出席孔子诞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会员大会——这在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在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相关思想，不仅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还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高度，明确了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

第二个节点是，在考察山东孔府8年后，在建党百年之际考察位于福建武夷山的朱熹园。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而且指出了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里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还突出了两者“有机”“激活”的关系。“相结合”的思想已经十分成熟。

第三个节点就是，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从党的指导思想高度作出了最为自觉、高度凝练、科学的表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三、新“相结合”澄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实践，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本质关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我们澄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有两点十分重要。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

社会主义不仅有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过程，还有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更有一个在实践中从摸索到成熟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的，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根植于具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中华大地，赓续科学社会主义的基因血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相对于以往认识，我们更应该突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没有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方面，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具有内在契合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揭示出，进入社会主义不是一种道德上应该确立的状态，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就是说，任何社会例如中国社会，假如没有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假以时日地发展也必将走向社会主义。“凡是那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则加快了这一进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而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中华文明本就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主义因素，例如中国古已有之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均贫富、重民生等思想，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发展、积淀，直至成为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尽管这还只是形成了马克思所谓的“素朴的人民园地”，但一旦遇到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彻底的理论，就瞬间被“思想的闪电”所“彻底击中”，一拍即合，产生震撼世界的历史效应。一句话，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看起来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实际上却有一种内在契合的关系。孟子曾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社会主义之于中国，也可作如是观。在此意义上，所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意味着中华文明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激活与开显。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不仅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赋予了社会主义一些本质性的品质。有人曾从中华文明政治一统思想、社会结构、协商共治传统、经济治理传统、天人合一思想、政教传统、民族治理体系、贤能政治传统等8个方面论述了中华文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塑造。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一种根性上的不同。例如，与西方无机、机械的原子论宇宙观相反，中华文化是一种以“生”为核心范畴的有机整体的生命本体论，崇尚生命，强调万物共生；与西方主客二分、冲突、征服思维相对，对“和”的追求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溶化在文化的血脉和基因之中；与西方强调理性、理智的传统相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情。纵看历史与未来发展，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在“一球两制”的当下，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作为“他者”；在东西方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客观上存在于今尤烈的竞争之势；着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形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华文明崇生、尚和、重情的特质，不仅仅具有文明差别的意义，而且具有了和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意义。

第二，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在回顾党诞生的历史背景时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而在谈到百年取得的根本成就时说，“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一百年，从“文明蒙尘”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也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人类遭遇了严重的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人自身的危机，特别是面临地区热点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疾病、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这些危机和挑战各有具体原因，但总的根源其实是近代以来强势的西方文明。尤其是在处理民族、国家、文明关系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自持优越，傲慢对待他者，秉持强权政治，以强凌弱，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致使世界冲突不断，危险重重，人类和平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人类的前途命运也蒙上阴影——人类文明蒙尘。种种事实表明，信守西方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可能意味着人类自身的终结！人类的拯救之途就在于开显出超越西方文明的新文明形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仅以视野、情怀而论，与西方古代的城邦、王国、帝国及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相对，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超越国家之上的天下观念。自《尚书》以来，中国思想百家争鸣但都尊崇天下之说，尤其是儒家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第功夫为人所熟知。尽管中国古人讲的国、天下并非就是今天理解的国家、世界，也非一个实质性的疆域概念，而是一种关于文明、道德秩序的文化想象，但天下观念确实打开了一种可能性，展现了一种超越的、普遍的维度，蕴含着中国特色的世界主义思想。“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直接成为中国人对理想的美好生活的畅想，“以天下为己任”也成为士人的立身传统。

在这种天下意识统摄下，中华文明对于不同生活方式、礼仪习俗乃至其他文明有着恒常的独特态度。首先，确认“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异也”（《列子·汤问》）。认为差异是正常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求一律。其次，认为“道无常名，圣无常体”，不同文化乃至宗教只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就可以“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完全可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再次，面对差异造成的矛盾，总是希望通过一定努力，最终使他者变成可以和平照面的“你”。其中最重要的是反求诸己，即提升自己的修养、境界，感化对方——“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这在西方文化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中华文明的天下意识以及对待其他文化、文明的情怀，可谓举世无双，与西方文明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其独特的文明根底尤其是善待“他者”的恒常态度，使得中华文明超越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成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也成为人类历史中唯一真实存在过的、最接近于各文明相处理想状态的“拟人类文明”。中华文明这种天下意识与情怀，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类存在观念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的思想高度契合而又凸显出崇生、尚和、重情、贵德的维度，这些正是当今西方文明所垄断的世界最缺乏和最急需的。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先后提出和践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构建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宣告和践行着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仅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且“为世界谋大同”。特别是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强调尊重文明多样性、平等协商、同舟共济，倡导以对话取代对抗，以交流超越隔阂，以互鉴超越冲突，以共存超越优越，以平等取代霸权，以结伴取代结盟等。这些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罕有论及的思想，更多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底蕴的现代性彰显和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原则高度的典范体现。

总之，从人类前途命运的角度看，中华文明所预示和开显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文明，正如社会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新形态。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的相互发现、相互成就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当代中国人必须有这种人类高度的“天命”意识，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传承发展中华文明，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永续发展和美好未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韩震：伟大建党精神奠基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基因结构，光明日报，2021年11月08日06版**

根据唯物史观，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之所以超越其他物种的活动，是因为人的实践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在意识上的自觉程度、精神上的境界高低、视野上的广度差异，就决定了其实践活动的内在品质和特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正是伟大建党精神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历史上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险阻，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更高远的精神境界、坚定的理想信念、广阔的思想视野和正确的目标追求。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为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构建自己精神谱系的活水源头。一百年来，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围绕完成不同历史任务进行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大别山精神、红岩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照金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北大荒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王杰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西迁精神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了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丝路精神等。所有这些精神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突出表现和具体体现，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延续和发展，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表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决心和意志。

作为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构建精神谱系的基因结构。正像宇宙间不同星球上因构成元素的区别而产生了不同的光谱，不同的精神基因结构也就塑造人们不同的人生追求。人们常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有着特殊的精神基因、禀赋和特殊的精神品质。伟大建党精神有四个基本的维度，形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结构，其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奠定了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特征的思想维度；“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奠定了以持之以恒的责任担当为特征的政治维度；“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奠定了以大无畏的奋斗意志为特征的实践维度；“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奠定了以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为特征的道德维度。这个四维度精神基因结构，既相互连接又相互助力，组成一个缺一不可的矩形结构。在其中，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责任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脊梁，实践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志，高尚品格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操。

在四个维度中，作为灵魂的理想信念处于核心位置，起着关键作用。100年的奋斗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有高度、有力量、有温度的。“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之所以有高度，是因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之所以有力量，是因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之所以有温度，是因其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在理想信念上特有的坚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正是建立在科学真理基础上的理想信念，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植根于历史、现实和时代的真实而深刻的使命感，让中国共产党人具备了泰山压顶也不能动摇的坚定信念，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地承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使命。在一百年的风雨兼程的奋斗中，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实践奋斗、高尚品格就有了不竭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实践奋斗、高尚品格又进一步确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不可摧的牢固性。

伟大建党精神具有的理想信念、责任担当、实践奋斗、高尚品格这一四维度精神基因结构，不仅形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而且也赋予其强大的传承动力；这一精神基因结构不仅像四根柱子支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而且作为精神支柱也支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平台。历史川流不息，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但起源于伟大建党精神之源的精神基因却代代相传。

我们说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和本，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延续，都带有伟大建党精神的基因密码，都闪耀着伟大建党精神的光谱。有的时候，四个维度以不同的方式交织，如作为井冈山精神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其中“坚定信念”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和“依靠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而“艰苦奋斗”既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道德品质，也与“勇于胜利”一起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实践的政治意志，“敢闯新路”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作为苏区精神的“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其中“坚定信念”是建立在“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艰苦奋斗”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道德品质，“争创一流”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使命担当的政治意志，“一心为民”“清正廉洁”和“无私奉献”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道德品质。有的时候，因时代、环境和任务的特殊性，有些精神更加突出四个维度中的几个，如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在其中，更多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实践意志、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和忘我奉献的道德品质，而坚定的理想信念则已经潜在于“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思想境界之中了。有的时候，四个维度的精神会有特殊的表达方式，如作为女排精神的“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与体育的特殊话语紧密相关，作为载人航天精神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则体现了科学技术人员在特别艰苦条件下，进行科学攻关所表现出的特殊精神气质，为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的前景，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奋力攻关，打破了美西方在科学技术上对我们的封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限荣光。

总之，有了基于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谱系的赓续，中国共产党就获得了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忆往昔，有了这种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就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从未动摇自己的初心使命，以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不怕牺牲的奋斗意志、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看今朝，我们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继续发扬光大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一代又一代地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3.吴向东：价值与文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光明日报，2021年11月15日15版**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这个重要节点，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对价值与文明进行百年探索的丰富历程，探究其价值建构与文明创新的丰富内容，追寻其探索创新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有助于促进价值与文明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进而从哲学的层面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价值与文明方面所创造的新境界，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一

价值文化处在社会结构的最深层次，社会变革的最根底处是价值文化的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意味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也意味着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不仅是器物的发展，也是文化和文明的更新。事实上，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之前，旧中国的有识之士就进行过一系列的救国探索。洋务运动强调器物，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强调制度变革，进而推翻旧的帝制。可是中国的价值文化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人们头上的辫子剪掉了，头脑里的“辫子”依然存在。正如罗素在《中国问题》（1922年）中所说的，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文化问题都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最难解的。为了解决价值文化问题，一大批先进分子苦苦求索，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始终保持着强烈的价值自觉和文化担当，把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作为自己的使命追求。

中国共产党对价值与文明的百年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价值重建为核心，推动着文化的变革和文明形态的创新，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历程。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强调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亦即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要实现的目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积极进行价值文化建设，致力于扫除旧中国遗留的贫困和愚昧，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力图通过若干个五年计划，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不同阶段，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给出了明确的文化发展方向。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江泽民同志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胡锦涛同志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在价值文化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和实践要求，适时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和战略目标，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价值文化建设与文明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研判世界文明的新走向、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新特点、文化与经济社会及科技关系的新动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竞争的新格局，将文化建设列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同时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

中国共产党对价值与文明进行的百年探索，不仅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也创造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丰富的思想与实践成果。

第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核心价值观，承载着民族、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我们党总会提出核心价值诉求，从“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到共同富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政治文化概念。它不仅历史地回应着中国近代以来价值文化领域的中西古今之争，更是直接切中着世界历史背景中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最深层次的问题。它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价值秩序的主心骨，是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更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展开的实践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建构的思想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形成的制度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生成的精神力量。

第二，构筑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与中国精神。精神是文化的灵魂和集中体现。黑格尔将精神、民族精神视为一个极其重大的哲学概念。“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弘扬和培育着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同时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伟大建党精神、中国精神，与中国道路、中国力量一起，回答了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也从精神文化层面深刻回答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如何成为一个中国人的重要问题。它们呈现着当代中国人的精气神，表达着当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马克思说，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面对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崭新理念，指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为主体，将人类视为相互依存的有机体，将不同民族和国家视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共同体，揭示了人类命运与共的历史事实，超越了西方以权力为核心的霸权主义文明观。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当代实践高度和时代特征，是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当代实践活动中共建共享的价值体系。它从价值层面上回答了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怎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是对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的回应。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基础，为变革和建设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价值引领，为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价值核心，为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和消解其话语霸权提供价值立场。

第四，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中国共产党以价值建构为核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取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谋求高度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统一，从而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类型，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道路之魂，是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气质，它所包含的诸多理念，以及其内涵的实践合理性、关系思维、共同体原则，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核。因此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社会主义发展的叙事，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叙事。它终结了“历史的终结”，超越了“文明的冲突”，开显着世界历史性的意义。

三

在中国共产党对价值与文明进行百年探索的实践中，不仅形成了标识性概念，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而且在价值与文明的古今、中西、新旧问题上，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与内在的基本原则，这些经验与原则无疑具有普遍性意义。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价值与文明进行百年探索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它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因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价值文化建设与文明发展的先进方向。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引发中华文明深刻变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其自身逐步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逻辑的自觉要求，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文化发展历史逻辑的内在要求。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和文化形态，推动了中国价值文化与文明的现代转型和当代发展，同时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坚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价值与文明进行百年探索的核心。价值文化与文明都与一定主体相联系，具有民族性和传承性，进而形成一定的传统。一方面，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它使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和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另一方面，创新、创造是文化的生命所在，是文明的本质特征，一种文化要真正传承并不断地延续下去，就必须适应时代要求和现实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因此，在价值与文明的实践探索中，我们既反对虚无主义，也反对复古主义，而是要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同时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无疑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通的结晶。

第三，坚持借鉴和吸纳世界优秀文明成果，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价值与文明进行百年探索的重要途径。价值文化与文明要保持创造力，就必然保持开放性。只有学习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批判性地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一国一族之价值文化与文明才能获得丰富滋养和发展动力。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批判地学习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积极成果。因此，在价值与文明的实践探索中，我们既反对排外主义，也反对盲目接受主义，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与文明。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即“以我为主、洋为中用、辩证取舍”，以此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正是这种学习、借鉴、批判，使当代中国价值与文明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创造性和开放性，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第四，坚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价值与文明进行百年探索的重要动力。“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平等是交流互鉴的前提，包容是交流互鉴的基础，傲慢和偏见则是交流互鉴最大的障碍。因此，在价值与文明的实践探索中，我们既反对文明的冲突，也反对文明的优越，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我们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不仅推动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而且秉持平等和尊重的原则，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文明创造性发展。